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陈平原 米列娜 主编

近代中国 的百科全书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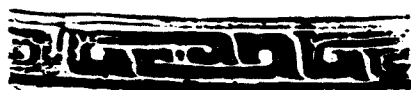
Z226/1

2007

书

陈平原 米列娜 主编

近代中国 的百科全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陈平原,米列娜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12743-8

I. 近… II. ①陈…②米… III. 百科全书-图书史-中国-近代 IV. Z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503 号

书 名: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米列娜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743-8/G · 21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刷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25 印张 218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

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代序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 的百科全书

陈平原

—

有两种出版物，发行量大，流通面广，但历来不被思想史或文化史专家关注，一是教科书，二是辞书。出版家则不一样，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参与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高梦旦（1870—1936）就坚定地宣称：“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1〕}在我看来，此话当真，不算“王婆卖瓜”。对于影响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辞书和教科书均功不可没。正因此，我曾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将学校、辞书、

教科书作为另一个“传播文明三利器”。理由是,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故无法“千里走单骑”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2]

同样以普及知识为己任,辞书和教科书的定位还是略有分别。讨论教科书的功过得失,教育家最有发言权;至于为何以及如何编纂辞书,出版家的意见值得重视。上述高梦旦的话,其实并不完整;虽则并列教科书和辞书,高强调的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3] 1915年,也就是《新字典》出版三年后,两部重要辞书面世: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中华书局则印行了《中华大字典》。后来的主编陆费逵(1886—1941)称:“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4];而前者的主编陆尔奎(1862—1935)亦云:“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5]。你可以说这是当事人的“自吹自擂”,不可信;我则认定,在这些“广告语言”背后,确实隐含着一代出版人普及知识、启迪民众的雄心壮志。这种混合着启蒙心态与商业计谋的“论说”,很真诚,也很“狡猾”,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的蔡元培(1868—1940)的话更有信心。就在出任北大校长的那一年,1917年10月,蔡元培撰《〈植物学大辞典〉序》,称:“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学术发展与辞书编纂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互为因果,流转无已”。此大辞典乃“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故值得大力表彰。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借此大辞典的出版,表达了如下期待:

所望植物学以外,各种学术辞典,继此而起,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

便，而吾国学术进步之速率，亦缘是而增进矣。^[6]

比起蔡先生另外两则谈论辞书的文章——1912年的《〈新字典〉序》和1925年的《〈哲学辞典〉序》——这篇同时刊于商务印书馆版《植物学大辞典》卷首和《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序言，更能代表其开阔的学术视野。

至于为何这么看重辞书的编纂与刊行，蔡先生只从“学术进步”立说，不及此前严复(1854—1921)和黄人(1866—1913)的论述精致。在严、黄二君看来，知识广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人对于新学说的望文生义、囫囵吞枣，需要权威的辞书来加以“界说”与“辨正”。1908年，严复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颜惠庆等编著的《英华大辞典》撰写序言，特别称誉西方辞典之花样繁多，有数十巨册，也有盈握小书，至于注解，更是各有擅场。“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7]三年后，严复又应邀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特别指出为何需要好的大辞典，就因为国人读书“不求甚解”：

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说，遂成故实，生心害政，波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8]

作为学部名词馆总纂，为一位大学教授编纂的“大辞典”写序，应该说是责无旁贷；更何况，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

主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在序言中，对“吾国之仅有字书、类书，而无正当用词之专书也”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国人之所以立说不严、思维混乱，缘于“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而这，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彼欧美诸国则皆有所谓词典者，名物象数，或立界说，齐一遵用，严以律令，非如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故名实不舛，异同互资。其国势之强盛，人才之发达，此一大原动力焉。^[9]

辞典之优劣，体现一国教育及文化水平之高低，这我相信；至于将晚清的国势衰微，与传统字书、类书之游移、淆杂相链接，似乎过于“微言大义”了。不过，借辞典“严定界限”，约束其时已变得汗漫无所归依的“新知识”，这一思路，明显属于学问家或思想家，而与革命家殊途——后者更倾向于使用“大字眼”来激动人心。这与严复一贯追求“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谈及他所拟想的“教育办法”，共有九条；最末一则强调“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而不是高谈政治：

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10]

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代指整个学问。“政论”是否真的容易谈，高喊“自由”、“平等”等口号是否就代表“骄嚣之风”，这里暂不分辨；我关注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学问确实“多朴茂之意”，而且也确实应力避“道听途说”。在这个意义上，眼看着西风日紧，严复、蔡元培等人格外看重各种专业辞书（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是有其深意的。

清末民初，近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导致知识系统遍布裂痕；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秩序正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各式辞典（还有教科书）的积极编纂。这里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性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整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广大读者。表面

上看,这些强调常识,注重普及,兼及信息、教育与娱乐功能的语文性或百科性辞书,不如著名学者或文人的批判性论述精彩(或曰“入木三分”),但其平易、坚实、开阔、坦荡,代表了“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同样值得重视。

二

对于一代人生活常识的健全以及知识秩序的完善,辞书起了很大作用。问题在于,所谓“辞书”,因体积与宗旨迥异,完全可能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视野、结构与趣味。谈及“词典的类型”,首先必须区分的,是百科词典与语文词典。当然,“词典分为百科性和语文两种,并不意味着一部词典必须非此即彼”;因为,“几乎在所有词典中都有百科性成分”^[11]。与捷克学者的意见大同小异,中国学者的补充在于,语文词典“往往兼收百科词条,并且百科词条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反,“百科词典不收语文词条”^[12]。而半个多世纪前,刘复将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词典,即字典、词典、百科词典(专论专名及专门名物者)和百科全书性字典(综合性大字典,将以上三者合一)^[13]。如此“大辞典”编纂计划,今天依旧值得我们体味。

在我看来,语文辞典与百科辞典各自的功能、体例及边界,到底该如何切割,不是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反而是另一组概念,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百科全书”或“百科辞典”之创造与接纳。那就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类书”与源自西方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之间既有联系又相区隔的错综复杂关系。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后人为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姜椿芳(1912—1987)编纂文集时,会选择《从类书到百科全书》作为书名。在该书中,姜先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陈述编纂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意义,同时又承认“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皇览》既是“中国类书之嚆矢”,同时又“成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的巨编”^[14]。称“类书”属于“百科全书类型”,但又刻意凸显其与现代“百科全书”的差异,此说并非自相矛盾,而是既定性又溯源,二者并行不

悖。

“荟萃已有文献，分类整理，条分件系，编纂成书，以备检索，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治学的传统。”而从三国魏文帝曹丕（187—226）亲自主持编纂的《皇览》算起，中国人已有 1700 年编纂类书的经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即便热衷于为百科全书溯源的专家也都承认：“1978 年，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终于起步。”关键在于，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相比，中国人古老的“类书”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重文史而轻科学技术”，无法体现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二是只“采辑已有经籍文献，汇辑成书”，而非邀请专家撰述，然后按词典方式进行编排^[15]。即便你将 1578 年编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说成“最早的一部接近现代类型的药物百科词典”，或者称 1639 年刊行的《农政全书》（徐光启）是“最早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16]，也都无法改变这么一个事实：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类书，最多只能说是现代百科全书的“远祖”或“先驱”——因其实际内容及编纂方式，均与现代百科全书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是康有为 1897 年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将“百科全书”这一概念带进了中文语汇。而“类书”与“百科全书”之间的纠葛，早在 20 世纪初年，就因三篇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文章，而开始被学者们关注。1906 至 1907 年间，享有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的英国泰晤士报馆，曾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代其销行这套四千余万字的大书。除在各报刊登广告文字，商务印书馆 1907 年还印行了一本题为《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的小册子，收入严复、辜鸿铭、李家驹、颜惠庆、李登辉五文，以及《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南方报》及《申报》上的相关评论。其中严、辜、颜三位，都在文中牵涉此话题。

晚清大名士辜鸿铭（1857—1928）是这样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西洋今日之学术，沿于犹太、希腊、罗马，亦可谓极其广大而尽其精微矣。独是西学分门别类，各有专科，提要钩元者，莫如类书。类书凡数十种，尤以近日太

晤士报馆所出之百科全书为最备。”^[17]而署“曾充上海约翰书院教习、丙午年应留学生考试取列最优等第二名、钦点译科进士”的颜惠庆(1877—1950),则称百科全书“即作中国进化券观亦可也”。因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因为其国“学无无用之学,人无不学之人,学术深而知识浚”;而这,又与其百科全书之浩博相因果。颜文附录《摘录百科全书评议》,其中有曰:“是书与中国类书,类而不类,不类而类。不类者,此为有用,彼为无用;类者,同资参考也。”^[18]辜将百科全书直接等同于中国的类书,而颜则有所保留;最能显示那个时代学术水平的,仍当推严复之文。

严复此文曾以《英文百科全书评论》为题,刊于《寰球中国学生报》。先是渲染百科全书的包罗万象,继则追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崛起,篇末点题,说明“家置一编”的必要性——因是应邀而作,如此展开论述,自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文专注于狄德罗等编纂《百科全书》的具体过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即所谓“泊书成而革命之期亦至矣”;另外,严复宁愿比附司马迁的《史记》——“然则《史记》者,真吾国学郭之权舆也”,而断然拒绝那备受推崇的《古今图书集成》^[19]——“惜乎!吾国之《图书集成》徒为充栋之书,而不足媲其利用也”^[20]。显然,作者注意到,《百科?全书》的特点在“写”而不在“编”——“两贤实司编辑”固然重要,而“令专长者各拟所知”更值得称道。对于此类“举古今字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无所不包的大书,严复完全放弃其与类书的对接,而另拟“智环”、“学郭”之名。

三

严复所描述的“百科全书”是一种理想状态,起码在晚清,不可能一蹴而就。故我们谈论“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时,不能不略为变通,将凡带有“百科”性质的辞典、丛书、类书等,统统纳入考察的视野,用以辨析现代西方“百科全书”进入中国的蹒跚步伐。

最早从事清末百科全书研究的钟少华,曾对此类书籍进行分类:百科全

书型(如《时务通考》、《万国分类时务大全》等)、专门百科全书型(如《艺学统纂》、《世界名人传略》等)、百科辞典型(如《博物大辞典》、《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等)、过渡型(如《西学启蒙十六种》、《新学大丛书》等)^[21]。随着学界对此课题兴趣的迅速提升,“清末百科全书”的搜集与整理得到长足进步。从钟少华十年前过目的42种,到今天瓦格纳搜集到的一百种,确实可借此窥见“当时出版业的兴盛发达以及知识群体对他们尚不了解的新知识和新信息的热切渴望”^[22]。至于到底哪个数字更可靠,取决于我们对“清末百科全书”的定义;这里只是描述其大的发展趋势,而不牵涉具体书籍之甄别。

谈及清末百科全书(或百科辞书)的宗旨、目标及编纂策略,首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编纂者,而后才轮到应邀作序的诸位当世名人。纂辑《时务通考》的杞庐主人,在序言中洋洋洒洒,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的《皇朝通考》,再转到道光年间如何开海禁,接下来方才是编纂此三百万言大书的意图:

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大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23]

称泰西政治“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是为了减少文化输入时常见的阻力;无论编者还是读者,真正关心的,都不是“三古”,而是“时务”。另一种“讲求时务”的大书——钱颐仙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同样刊于1897年。书前有凡例十七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

是编采缀搜罗,考异辨同,凡无关于时务者概不摭入。间有中国议论发明,外国时事亦择其紧要者采入,以资考证。学者读此一编,抵读千万篇西国文字,任拈一题,任构一艺,定皆得心应手,如悬崖绝壁撒手

横行，不复有攀萝扪葛之苦。^[24]

此类高调论述，兼及政治与商业，在清末百科全书的序跋中多有出现。只是“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这样的“警句”，难得一见，更多的是近乎“八股文章”的广告文字。1898年刊行的《洋务经济通考》，编者到底是谁，说法不一；这么一来，那确凿无疑的出版者，其态度更为要紧。鸿宝斋主人在该书叙言中称：

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25]

正是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出版者方才约请有心人编就此“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的大书。有清一代最后十几年，学界及出版界均大有长进，轮到曾朴、徐念慈登场，已经不能再含糊其辞，使用“洞达夷情”、“有关时务”之类不着边际的大话了。若《博物大辞典》的七则“例言”，便是条条都有着落。请看第一则：

我国通行学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莫要于博物一科，因先编纂付刊，余当续出。^[26]

百科辞书的编纂策略，从“辑”到“编”到“译”，终于走到了“撰”；主要的拟想读者，从传统士大夫转为新学堂的教师学生；辞典专攻对象，不再满足于政经或文史，而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四部分），由此可见，清末百科全书终于完全走出传统类书的阴影。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那些百科全书（辞书、丛书）序言的作者，因其中

颇有名动朝野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大都博学,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既非“守旧”,也不“革命”。如晚清状元、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张謇(1853—1926),曾为英国人艾约瑟译编的《西学启蒙十六种》撰序,称:

是书盛行我中土,才智聪明之士,必不憚殚厥精能,以求造乎其极,庶几富强之术,不让泰西独步。^[27]

“曾门四弟子”之一、兼具文才与使才的薛福成(1838—1894),为邹弢编《万国近政考略》作叙,批评近日之谈洋务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只晓得“声援气引,粉饰粗疏”,并没有真学问:“呜呼,洋务之不易言,通才之所以难得也。”^[28]言下之意,谈社会改革,非有此类百科全书之指引不可。著名金石学家、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澂(1835—1902),为《时务通考续编》所撰叙言,谈及此前出版的《时务通考》之功德:

凡环球各国是非得失大小强弱之故,鳞集锦萃,一经披览,靡不了然,谈经济者几于家置一编,奉为善本,备异日敷陈规划之资。^[29]

至于晚清大儒俞樾(1821—1907),在《新学大丛书》的序言中称:

日本地居五岛,蕞尔微区,而自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来,讲求西法,辑译成书,以资考验,故今日得于文明之列。而中国地大物博,反不如也。于是圣天子锐意求新,立行变法。乃下谕臣工,博采西法,师彼之长,补我之短;取彼之优,助我之绌。一时朝野上下,欢腾众口,振作精神,力行新政,维是风气初开。^[30]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编纂新学辞书及丛书的重要性。

晚清亲自参与百科全书编纂的,偶有名士,若马建忠、钱恂、曾朴、黄人

等;但更多的编者属于“非著名”人物。而借助于俞樾、吴大澂、薛福成、张謇等序言的鼎力推荐,起码让当时以及后世的读者,明白这些大型出版物对于时人的意义。书局之积极刊行此类“百科全书”,除了寻求新知、变革社会的宏愿,可能与晚清新政的展开相纠葛,也可能只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变化^[31]。走出纯粹的辞书编纂技术考察,将其置于生死存亡、波澜壮阔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百科全书的研究,或许可以获得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四

1979年,姜椿芳为《百科知识》月刊撰写“代发刊词”,题为《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特别强调:“百科全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出版百科全书是一项科学文化的基本建设”。文章还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和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前者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后者“当然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和法国《百科全书》同日而语的”^[32]。还有一点,姜先生尚未谈及,那就是,作为一种“文化工程”,百科全书(或大型类书、丛书)到底更适合于由政府主持还是民间独立来完成。无疑,二者各有利弊——由朝廷出面,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但容易走向思想钳制(鲁迅有激愤语:“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33]);让民间做主,则往往遇到经费窘迫之困境(严复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编辑汇著之人,屡濒于难”^[34])。或许,天底下本就没有“万全之计”。

既然是浩大的“文化工程”(而非学者或文人的个人撰述),投入肯定少不了。这个时候,作品(假定就是“百科全书”)的学术水准,与其经济实力往往成正比。“词典编纂工作是一种费用很大的工作——如果就通常在人文科学中的规模来衡量,情况至少是如此。”因此,专家建议,编纂大型辞书,最好是由科学院、大学或基金会来支持。偶尔也会有出版社愿意投资,但那

“只是那些预期出售后能获得某些收益的词典才能在这种条件下编纂”^[35]。在晚清,朝廷风雨飘摇,根本没有闲心闲钱来管这种“闲事”;大学刚刚创立,自身地位尚且难保,也不可能有如此大手笔;说来说去,唯有新近崛起的书局,出于文化责任以及商业眼光,还有兴趣“赌一把”。这种局面,直接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策略及实际效果。

编纂辞书,可雅可俗,既是社会责任,也是生意经。而且,这雅俗二端,有时无法截然分开。想想民国年间如日中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是靠辞书或教科书起家的。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但凡做出版的,都会拼命抢占这两个市场。当然,正因竞争激烈,且投入较大,拼辞典、教科书而血本无归的,同样大有人在。在这个意义上,编纂百科全书,也可以是一种“启蒙的生意”——这个词,是从美国学者那里学来的。罗伯特·达恩顿在谈及《百科全书》时称,启蒙不仅仅是精神,还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品”;因此,“启蒙”也有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不仅是18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十八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36]。同样道理,清末的百科全书,既有俞樾、张謇以及严复、黄人等所论述的“崇高使命”,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出版生意。

既然是生意,就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投入多少,利润如何,到底是赚还是赔,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之是否“可持续发展”。而这,不只牵涉到编纂者的才能、出版社的实力、学界的视野,还有读者的趣味——后者直接影响了这些大型出版物的购买、阅读与消费。诸名士慷慨陈词,说得天花乱坠,但若读者不买账,一切都落空。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确实需要此类“百科全书”;可现实生活中,这些出版物的社会认知度以及销售状态,都不是很理想。即便像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或唐敬皋编《新文化辞书》,已经算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而且也都曾风光一时,可依然无法长销不衰^[37]。辞书不比个人著述,很快被遗忘,也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失败”。晚清百科全书数量庞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全都没有充分展示自家风采的机会,不是一个好现象。